

认识早期华人社会面貌的视角—新山绵裕亭义山 墓碑普查的研究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Early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ombstones in Mian Yu Ting Cemetery of Johor Bahru, Malaysia

白伟权* 陈国川**
(PEK Wee Chuen) (CHEN Kuo Chuan)

摘要

义山墓碑所记录的墓主祖籍、姓氏、卒年、性别等资讯,都蕴含了地方各时期的人口组成与社会面貌。因此在缺乏文献辅助的情况下,墓碑便成为重要的替代性资料来源。本文以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街外的绵裕亭义山为操作对象,透过墓碑的祖籍、年代及其空间分布等资讯,分别讨论19世纪及20世纪新山的人口组成与帮群结构、社会组织,以及帮群关系,尝试拼凑出一个华人市镇早期的社会面貌及其变迁过程。

藉由墓碑普查与分析,研究发现19世纪新山的人口规模小,帮群以潮州人为主,在性别比方面也呈现男女比例悬殊的移垦社会特质。潮州义兴在当时华人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他小帮群在潮州人为主的社会共同分享资源。进入20世纪,新山人口大幅增长,帮群间人口比例的差距缩小,潮州人的优势地位淡化,义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呈现减弱的趋势。新山华人社会的产业部门结构已逐渐完整,更重要的是,商闕需求较大的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出现,展现华人社会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部门分工,产业多元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也为新山华人社会由五大帮群共同领导创造了重要条件。

关键词: 新山、华人、义山、地方社会

* 白伟权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候选人。电邮地址: hgking1000@yahoo.com

** 陈国川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电邮地址: t24015@ntnu.edu.tw

Abstract

The tombstones in Chinese cemeteries are engraved with such information as the tribe, surname, the date of death or gender. Such information enables the researcher to trace the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and certain social features at different times. This is a study on the Mian Yu Ting cemetery of Johor Bahru (JB) and to investigate, and to discuss the population, dialect composi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JB.

From the analysis of tombston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JB was small and dominated by the Teochew during 19th century. The gender imbalance indicates a typical social feature of the pioneering period. Meanwhile, Teochew-based Ngee Heng society was influential in JB Chinese society, while immigrants from other dialect groups tended to join this social order or a share of upon the prosperity. Entering 20th century, population growth led to a balance between various dialect groups and the influence of Teochew and Ngee Heng declined gradu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s in JB and the existence of catering,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service sectors, the economic landscape broadened and diversified. These and other factors were all important in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closely-kni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ajor dialect groups.

Keywords: Johor Bahru, Chinese, Chinese cemetery, local society

一、前言

在马新各地区华人社会的讨论中，各时期的人口及族群组成是研究的基础材料之一，这些资料主要来自政府所出版的人口统计。在政府各时期的人口普查资料中，按地区细致地呈现了区内人口的人口数、族群结构、就业、年龄、性别比等社会属性，(Nathan, 1922)可作为了解各时期社会面貌的重要指标。然而，官方所出版的统计资料却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两大限制。

在时间方面，由于殖民政府执政或介入土邦政权的时间较华人移民的脚步晚了许多，且到了后期才开始进行有系统性地调查，使得官方资料出现的时间较晚。以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 S) 檳城 (Penang) 的人口普查 (population census) 为例，其开埠时间为1786年，但迟至1871年才有简单的人口调查，有籍贯分类的人口普查则到1881年才出现；隶属马来联邦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F. M. S) 霹雳 (Perak) 的华人市镇太平 (Taiping)，虽然早在1840年代便有大量华人活动，但迟至1891年才开始出现人口普查；(麦留芳 2000: 3) 马来属邦 (The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U. F. M. S) 柔佛 (Johor) 境内的华人市镇新山 (Johor Bahru) 虽然开埠于1855年，但到了1910年，其人口普查资料才开始出现在官方统计资料当中。由此可见，官方资源虽然较具有公信力，但由于出现时间晚，且各地资料出现的时间不一。以致研究过程中，常遭遇瓶颈。

在空间的限制方面，政府的统计资料比较偏向于政府所查定的行政界线，或是统计区，这些空间范围一般较大，经常涵盖多个市镇及自然村。以英属马来亚的人口普查为例，即使到了1931年，偌大的柔佛在华人祖籍地 (tribe) 统计方面，也仅分为Johore Bahru、Muar、Batu Pahat、Segamat、Kota Tinggi、Kukup以及Endau等7个统计区，

(Vlieland 1932: 188) 且当时所谓“新山”的空间范围实际上还包含了今天的居銮 (Kluang)。¹ 由于华人的聚居多以市镇及自然村为单位, 故行政区或统计区会使研究者难以从官方统计资料中, 了解地方社会的人口情形。

在民间资料方面, 由于非统治需要, 因此一般不会耗费大量人力及财力去进行人口普查的工作。因此研究者一般会透过庙宇、学校、会馆的碑铭资料, 以及一些族谱、名册等, 来了解早期华人社会的面貌。但可惜的是, 民间资料, 特别是战前的文献, 一般都未得到良好的保存, 流失严重, 因此影响现今人们对开发初期地方社会面貌的认识。

除了庙宇和会馆的碑记、名册等资料之外, 另一项重要的民间资料便是义山上的墓碑。在马新地区, 所谓的“华人社会”大多以市镇聚落为空间单位,² 每个华人聚集的地方, 都会拥有属于该地的华人义山, 供当地华人安葬。义山往往伴随着移民的脚步而出现, 它是地方社会中, 人与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内部所保存的, 正是一个地方社会开埠以来的人口资料。

一般上, 墓碑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性别³、祖籍、忌日, 有的还会刻上墓主的子嗣、生辰、勋衔和生平事迹, 因此墓碑可谓逝者的“身分证”。由于义山自开山以来, 便有人陆续下葬, 因此义山中充满了不同时期的墓碑, 而各时期的墓碑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 而带有属于当时的一些元素。因此, 义山的墓碑就如同花粉般, 层层地堆叠在义山的土地上, 成为有待打开的时间胶囊, 为我们保存了地方先民的“户籍资料”。单一几笔墓碑资料能扮演的角色虽然不大, 但对义山中的墓碑整体进行“普查”(census) 整理, 似乎就能发挥政府人口普查资料的功效。人口普查指的是某一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 对其全部人口的自然与法律身分及其各种社会属性, 作有系统地搜集、整理。(颜贝珊、余清祥 2010: 205) 是故, 墓碑的普查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一地在官方文献尚未出现前的一些社会风貌。

基于以上义山的特性, 本研究企图以具马来属邦背景, 且各种早期资料较缺乏的柔佛州新山市街为个案, 透过搜集当地所属义山中的墓碑资料, 分别就19世纪及20世纪新山的人口组成与帮群结构、社会组织, 以及帮群关系进行讨论。希望透过义山内部墓主的帮群属性及其分布进行普查、分析, 以勾勒出新山开埠至二战前, 华人社会的面貌。

¹ 1931 年的人口普查虽然也出现以市镇为单位的空间资料, 但仅限于人数、男女及户数的统计。(Vlieland

² 1932: 134-136)。

³ 华人移民所到之处多形成各个规模不一的市镇或聚落。

出现“考”、“公”者为男性, 出现“妣”、“氏”者为女性。无前述字眼者也多能从名字中判定墓主性别。

二、研究区简介

新山位在马来半岛南端，为今天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首府，开埠于1855年。⁴ 由于新山早期在帮群组成上，以潮州人居多，故有“小汕头”之称。19世纪，本区为柔佛王国领土，由柔佛苏丹底下的重臣天猛公⁵ (*Temenggong*) 掌握实权。为了累积经济实力，天猛公于1844年在柔佛地区推行港主制度 (*Kangchu System*)，⁶ 透过从新加坡招徕有势力的华人进入柔佛丛林中进行土地开发，发展胡椒、甘蜜为主的热带栽培业。当时能够掌握大量劳力与资本的华人组织主要都与会党有密切关系。由于柔佛统治者与潮州系会党“义兴公司”⁷ 交情甚笃，因此赋予义兴公司在柔佛地区的垄断权，当时政府“独尊义兴”的政策也明令在国家的港主法令 (*Law of the Kangchus, 1873*) 之中。⁸ 在此背景下，义兴公司藉由胡椒、甘蜜产业的发展，不仅掌握了柔佛王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控制了柔佛的华人社会，所以义兴领袖同时也成为了社会的头人。

新山作为柔佛国都，它扮演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角色，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市街聚落，因此无论在聚落型态或是功能上，都有别于一般所谈的“园丘”⁹ 或“港脚聚落”。此外，新山也是柔佛义兴公司的大本营，这里的义山拥有为数众多的“冚”墓，¹⁰ 许多重要的义兴领袖也安葬于此。此外，新山是马来半岛19世纪中叶开埠的众多市镇里，少数呈现帮群相对整合的华人社会，因此有关新山华人帮群关系发展的议题在马新地区经常成为学界讨论的对象。

一般认为新山帮群整合的现象与潮州系会党义兴公司有关，义兴也扮演了华人社会最高机构的角色，并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各个帮群，成为五帮兼容的组织，因此它被认为是促成新山华人社会整合的重要驱动力。(Khuo, 1997; Lim, 2000; 郑良树, 2004) 虽然义兴到了20世纪开始没落，并已在政府的指示下，于1916年奉命解散，但是义兴在后来新山人的心目中还是有着一一定的地位，从事新山华人帮群研究的学者更以“义兴精神、古庙精神”来概括新山五帮能摆脱帮群羁绊，通力合作的背后机制。(郑良树, 2006; 安焕然, 2008)

⁴ 新山开埠时称“伊斯干达布特里”(Iskandar Putri)，1866年才正式改称“新山”(Johor Bahru)。

⁵ “天猛公”(Temenggong) 是传统马来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官职。从马六甲王朝以至(旧)柔佛王朝时期，其在朝中的地位便仅次于苏丹底下的丞相(Bendahara)。天猛公相当于现代的内政部长以及总督，主要负责管辖区内的司法、治安、防御、外国(商)人事务和贸易商品的税收等。(Trocki 2007: 24-25)

⁶ “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 是一种开垦制度，向天猛公取得港契(*Surat Sungai*) 的华人领袖称为“港主”，他们在柔佛特定许可地区内进行土地开发与生产，种植甘蜜、胡椒，该地区也称为“港脚”。港主拥有港脚地区经营鸦片、酒、猪肉、妓院、典当、赌馆等生意的专利权。此外，天猛公也将许可区内的治安、税收、行政等管辖权全权交由华人管理，而华人则须定期向天猛公纳贡。

⁷ 义兴公司属洪门会的一支，在南洋各地都拥有分支，势力庞大。在新加坡，义兴公司共有潮郡义兴(*Tie-Kun Ghee Hin*)、福建义兴(*Hok-Kien Ghee Hin*)、琼州馆义兴(*Hailam Gee Hin*)、福兴(*Hok Hin*)、广福(*Kwong Hok*)、松柏馆(*Siong Peh Koan*)、广惠肇(*Kwong Hui Siau*)、义信(*Ghee Sin*)、义福(*Ghee Hok*)等分支，(Pickering, 1879) 每个分支组成的方言群都不一样。

⁸ 港主法令第十三条：“港主须遵守先王所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Law of the Kangchus/ Kanun Kangchu, 1873* (许云樵, 1977)

⁹ 指热带栽培园。

¹⁰ 一般相信，“冚”墓与早期反清复明的会党有关，虽然19世纪中后期的会党并无反清意识，但仍以“冚”为重要的符号标记。由于义兴为柔佛唯一受认可的会党，因此相信“冚”墓的墓主与义兴有密切关系。更多“冚”墓与义兴关系的讨论详见：白伟权(2013)，〈绵裕亭义山的“冚”墓〉，《九鼎传薪，世代为公：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页449-463。新山：中华公会。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将华人义山内所能见到的墓碑进行文字记录，并以GPS定位，最后再进行照相。除了正常的墓碑外，无论是倒下、碎裂，或是一半埋在土里的，一律都加以扶正、拼凑及挖出记录。墓碑字迹模糊者，则涂上粉笔灰以令字迹浮现，躺卧者则将细沙覆盖并扫除以后，凹陷处便会出现明显的字迹。

空间范围上，本研究取样的地点主要在新山北北东约2公里以外的绵裕亭义山。（图1）此外，由于该义山靠近大马路的部分区块曾于1970年代因道路拓宽而被征收，该区所清除的骨骸与墓碑均被迁往新山中华公会辖下的哥打路义山，并设立“新山先民总墓”加以安置，当中有刻上姓名的墓碑也被中华公会加以记录编成《新山先民碑文名表》，另外也有少部分墓碑在哥打路义山被重新安置。本研究的墓碑调查工作于2010年1~2月、7~9月进行，期间共调查了1,687个墓碑，共2,020个墓穴。¹¹其中具有明确祖籍和年代，可充当各时期华人帮群人口统计资料的有效样本有1,156个，占总样本数的68.5%。（表1）

时间上，本研究以1861年至1942年二战之前为时间段，将这期间的墓碑资料加以整理之后，将分别从19世纪与20世纪两大部分，来检视新山华人社会的人口面貌及其变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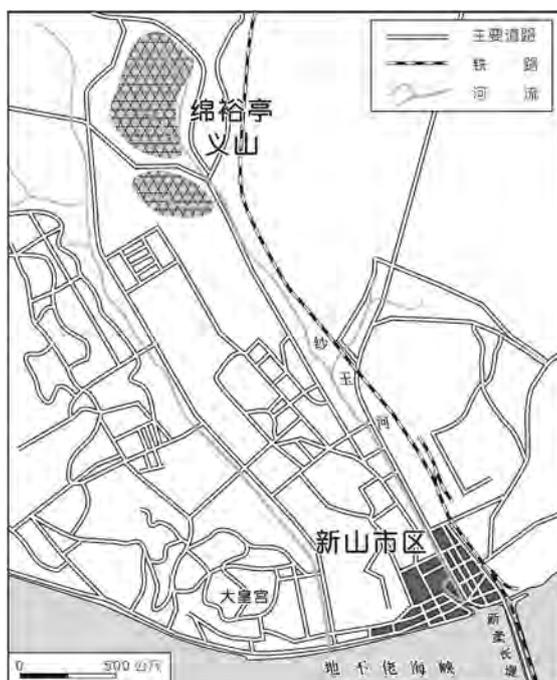


图1：绵裕亭义山现今的位置

说明：转绘自1944年的新山市区图（Johore Bahru Town）

¹¹ 一块两夫妻合葬的墓算为2个墓穴。

表1：绵裕亭义山墓碑调查样本数

资料来源地	墓碑样本总数*	无效样本**	有效样本	有效样本百分比
绵裕亭	1,358	353	1,005	74.0%
哥打路义山	41	22	19	46.3%
《新山先民碑文名表》	288	156	132	45.8%
总数	1,687	531	1,156	68.5%

* 不含无列姓名之总墓与无主墓（如明墓、客社总坟、刘关张赵坟墓、古人墓等）。

** 无法辨识或无注明祖籍或年代者，均视为无效样本。

*** 一些抬头标示“祖”字的墓碑虽然没有写上祖籍地，但基于“祖”字抬头是潮州墓的特色，（李永球, 2009）因此研究当成潮州墓计算入有效样本之中。这类样本只有36个。

四、19世纪的绵裕亭义山与新山华人社会

（一）绵裕亭义山的设立背景

新山在1855年开埠前后，相信便已出现华人的踪迹。最早前来的华人主要在新山从事开发活动，在开发初始阶段，本区仍属于沼泽杂木遍布的原始森林，这样的环境对人类而言，实为一个充满险恶与生命不确定性的环境。在此环境下从事开发的先民基本上都会遇到兽患以及疾病肆虐的环境威胁。

其中兽患又以老虎、鳄鱼和蛇类的威胁最为严重。19世纪中叶的柔佛，每天都有人死于虎口。（Buckley 1902: 574）柔佛政府也对此开出高额的奖金鼓励民众捕杀对人们日常生活有巨大威胁的猛兽。¹²

在疾病威胁方面，本区湿热的环境是病毒滋生的温床，这些病毒往往使外来者遭受热带疾病的侵袭，如：疟疾（Malaria）、黑水热病（Black Water Fever）、肠热病（Enteric Fever）、脚气病（Beri-beri）、肺炎（Pneumonia）、痢疾（Dysentery）、腹泻（Diarrhoea）、雅司（Yaws）、钩虫病（Ankylostomiasis）等。¹³在医疗和卫生条件尚未成熟之际，疾病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

以上所提及的案例大多发生在19世纪后期，即新山已大致开发完成的时代，故可想而知，在新山仍处于环境尚未被驯化的开发阶段时，类似的环境威胁情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此在新山拓垦初期，“死亡”成为当时华人社会日常所需面对的切身问题。在此情况下，主导新山上层社会的义兴领袖同样也为自己和底层的苦力劳工设立义山。由于该义山的设置与义兴公司有关，故早期也被称作“公司山”，（Cowgill 1924: 230）现今则被称为“绵裕亭义山”。传统上，华人对于“死亡”多抱持敬而远之的敬畏态度，这样的价值观也

¹² 在19世纪末，政府悬赏一头老虎的价码为500元、鳄鱼为25元、蛇为1元。（Fairlie 1892: 586-587）

¹³ 这些热带疾病直到英国统治柔佛之后，仍然十分盛行，因而受到政府关注。政府也透过提升公共卫生条件着手解决。在1910年开始每年出版的柔佛年报（Johor Annual Report）当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统计与报导。

导致义山分布于新山市街外围处。

时间上，虽然没有任何有关义山设立年代的记载，但根据史料，义山早在1885年便由苏丹委托Kian Koon Kongsì（乾坤公司）¹⁴ 进行管理，（叶汶鑫 1997：70）但据目前田调发现，义山内最古老的墓碑志期为1861年，故可以推测至少在1855年新山开埠至1861年间，该义山便已作为葬地之用。¹⁵

（二）19世纪新山的人口组成与帮群结构

根据现有的史实，可以知道义兴公司在当时的华人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新山的义兴党属于潮州义兴，¹⁶ 在潮州系会党的主导下，早期到此谋生的人也多以潮州人为主，新山因而也有“小汕头”之称。透过墓碑的调查，此一事实有了具体而详细的表现。（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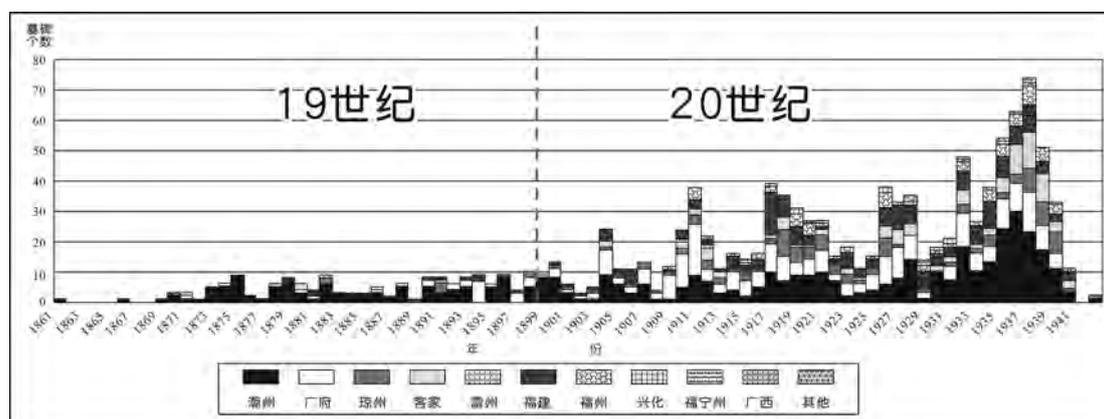


图2：1861年至1942年绵裕亭义山墓碑数与帮群结构变化

¹⁴ 一般相信乾坤公司的“乾坤”一名，其实有着“天”乾“地”坤的意义，因此与柔佛唯一受政府认可的天地会组织—义兴公司有关。

¹⁵ 在一些无文献资料的小镇，这样的墓碑资料也常被用来作为该地开辟时间的参考。

¹⁶ 马来亚各地的义兴组成成员各不相同，以新山对岸的新加坡为例，当地的义兴主要可分为潮州、福建、广府、海南、客家五个派系。（Vaughan 1879：108）

在 19 世纪新山华人人口的组成上，可分作以下两个阶段来谈：（表 2）

表2：19世纪绵裕亭义山内墓主的祖籍来源

年代	祖籍 单位	广东省					福建省					客家	广西省	其他	总数	男 (人)	女 (人)	性别比 (男=1000)	
		潮州府	广州府	肇庆府	高州府	琼州府	雷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福州府	兴化府								福州府
1861年 — 1880年	墓碑个数	35	2	1	0	1	0	2	0	0	0	0	4	0	0	45	42	23	548
	%	77.8	4.4	2.2	0.0	2.2	0.0	0.0	0.0	0.0	0.0	0.0	8.9	0.0	0.0	100			
1881年 — 1900年	墓碑个数	63	23	3	0	8	0	9	3	0	1	0	3	0	0	113	95	49	516
	%	55.8	20.4	2.7	0.0	7.1	0.0	8.0	2.7	0.0	0.9	0.0	2.7	0.0	0.0	100			

注一：表格是以祖籍作为分类依据，但祖籍地的分类无法凸显出口操客语移民的身份，故本研究将分布于闽、粤各地的客家人独立分类。客家的认定依据主要来自操客语方言者聚居的祖籍地，如惠州、大埔县、陆丰县、梅县等地。

注二：由于许多墓碑为合葬性质，故会出现一个以上的名字。墓碑一般并不标明墓主妻室的祖籍地，由于早期社会帮群间通婚的情况较少，故上述以祖籍为调查的单位并不考虑墓主妻室的祖籍，而以墓碑个数的家户祖籍为准，性别则另做统计。

注三：性别比中，采用男性 = 1000人为基数，是以1921年英属马来亚人口普查的性别统计为依据。

资料来源：2010年2、7、8、9月田野调查

1、1861—1880年：

在此期间使用义山者有45个样本，当中近80%为潮州籍，其他帮群仅有10个，即客家4个，福建2个，海南1个，广府3个，¹⁷比例相当悬殊，可以反映当时新山华人社会几乎由潮州人所组成，其他帮群比重很小，是一个相当单纯的潮州人社会。此外，在男女性别比例方面，可以发现这时候的社会以男性居多，性别比例差距大，说明前来工作者多为男性，新山呈现了典型性别比例悬殊的移垦社会特色。¹⁸

¹⁷ 福建人主要指来自（清代）福建省漳州、泉州两府，讲闽南语的移民；广府人主要指来自（清代）广东省广州府、肇庆府、高州府，讲广府话的移民。

¹⁸ 移民比例高、男多女少等都是移垦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李国祁 1978：135）

值得注意的是，新山开埠初期，草莱初创，人口死亡率必定趋高，故这期间的墓碑数理应较多，但事实却不然，此一事实除了反映当时新山人口规模较小外，也可能显示并非所有死亡的人都有能力设立墓碑。一般而言，在移垦社会的拓垦初期，许多拓垦者死亡后经常无法得到妥善安葬。（林富士 1995：43-46）就新山而言，拓垦初期许多无家无业的苦力劳工，去世后并无后人收殓，常常被路死沟埋，草草下葬。这些被草草下葬的底层人士，有的后来被所属的组织收纳于总墓之中，一些没有被组织收纳者，则可能零星分布于绵裕亭的无名墓中。¹⁹

这些无名墓是由后人发现骨骸而立，它们并没有标示任何的名字以及组织名称，有的看似个人冢墓，有的则是集体冢墓。（表3 照片1）因此相信它们未能有效地受到各社会组织的照顾，以致身后事的处理与一般人不同。地方无法妥善处理丧葬事宜的情形，或多或少也与地方开辟初期，会馆等社会组织的照顾机制尚未发展健全、成熟有关。

表3：绵裕亭义山内的无名墓

墓碑名称	数量	性质
古人之墓	2	个人冢墓
古人墓	10	个人冢墓
古先人之墓	1	个人冢墓
先人之坟墓	1	个人冢墓
各位良友之墓	1	集体冢墓
百姓公之墓	1	集体冢墓
男女百姓之墓	1	集体冢墓
众位公妈	1	集体冢墓

资料来源：2010年7、8、9月田野调查

¹⁹ 后来由于有的人下葬于此地，在挖掘墓窟的时候发现这些遗骨，故将先人下葬立碑的同时，也同时为此遗骨建立墓碑，置于墓旁，日后在扫墓时共同祭拜及修葺。（照片 1）



照片 1：与一般墓共同建立的“古人墓”
拍摄日期：2010年9月18日

2、1881—1990年：

在此期间使用义山者共有113个样本，较前一阶段增加了1倍多，在它们之中，潮州墓有63个，广府26个、海南8个、客家3个、福建12个、兴化1个，除了显示新山人口的增加以外，也意味着有能力竖立墓碑者增多。在帮群结构上，无论是在帮群杂异性或是比例，其他帮群均有所增加，但与潮州人相比，比例仍然悬殊，潮州人继续成为新山华人社会的优势群体。新山男女性别比则仍处于男多女少的状态，仍凸显以男性为主的移垦社会性质。

在上述两个阶段的人口组成之中，可以了解新山华人社会在1855年至1900年间，是处于帮群单一、男多女少的移垦社会。此社会中，潮州人占了绝对多数，但这样的情形其实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他帮群的人口比例在后期开始出现增加的趋势。

（三）19世纪墓碑资料所呈现的社会组织

在现有史料中，可以知道义兴公司在19世纪的华人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透过义山的田野调查，仍可发现许多“冃”字抬头的墓碑。一般相信，“冃”有着“清朝无主，大明复半”之意，因此与早期反清复明的会党有关。（陈育崧 1970：100-103）由于义兴在柔佛具有合法地位，²⁰ 因此相信此一符号与义兴公司有关，虽然19世纪中叶后的义兴已经不一定具有反清意识，但人们还是使用此符号来作为一种身分的象征。（白伟权，2013b）

²⁰ 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在1880年代末纷纷开始查禁与天地会有关的会党，因此义兴在柔佛的合法地位显得相当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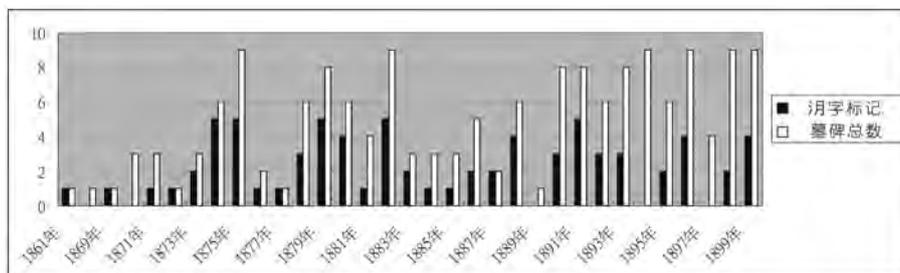


图3：绵裕亭义山“泅”字碑与一般墓碑的比较(1861-1899)

注：1862、1863、1864、1865、1867、1868年无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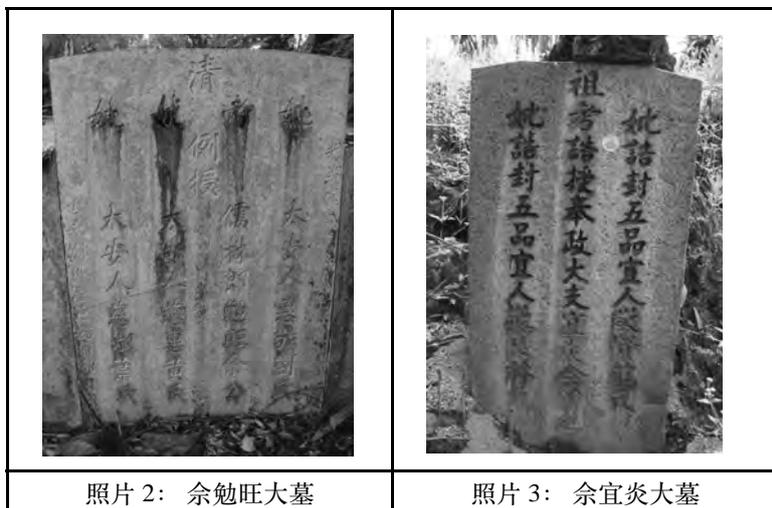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0年7、8、9月田野调查

此时期的样本之中，可以发现墓碑标“泅”字的比例甚高，由图3可以显示接近半数（26: 45）的墓主都可能与义兴有关，这种现象在19世纪尤其显著。田野中所发现的“泅”墓共有155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泅”字墓碑中，潮州籍的比例极高，共有94个，占约90%。除了潮州人之外，其他祖籍者的“泅”墓仅分别为琼州3个；福建2个；客家2个；雷州1个；老港1个；其余无法辨识及无标示祖籍者有52个。²¹ 有趣的是，在新山位居第二大帮群的广府人竟无一人墓碑上使用“泅”字，故可能原因是广府人与义兴较无关系，并未加入义兴的社会体系之中。

此外，19世纪晚期的义兴领袖，反清复明的会党色彩已经减弱，且有向清朝输诚的趋势。余勉旺和余宜炎两个具影响力之义兴领袖的墓碑，证明了此一论点。余勉旺是新加坡义兴公司宗祠所供奉的72个神位之一，其牌位刻上“明勋义士讳勉旺余府君禄位”，（庄钦永 1996: 48）但在绵裕亭义山的余勉旺大墓却与一般义兴成员的墓碑不同，既没有惯用的“天运”年号，亦无“泅”字标记，反而以“清光绪”为年号，更向清廷捐赠了“儒林郎”的官衔。（照片2）

余宜炎（余壬癸，Seah Jim Kooy）为本义山信托人，也是新山经营胡椒、甘蜜贸易的富商之一，（Colonial Governmen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5: L4）1886年与余能财（Seah Ling Chai）等人承包新、柔等地的鸦片餉码权。（Trocki 1990: 192）其在绵裕亭义山的大墓同样无任何义兴公司标记，反而出现“诰授奉政大夫”的捐官纪录。（照片3）捐官为当时富商为提高社会地位常见的做法，（颜清湟，2007）原本具反清复明意识的义兴领袖向清朝捐官的行为更凸显了这时期的义兴领袖较浓厚的商业色彩。

²¹ 事实上，在潮州人垄断的社会中，许多潮州人或许都已不标示祖籍，但为小心起见，本研究并不将之纳入计算。倘若将之加入计算，则潮州“泅”字碑的潮州人比例将会更高。



拍摄日期：2010年8月8日、2010年9月18日

在整个19世纪当中，从“泅”墓的分布情形，可以得知潮系会党义兴公司在当时潮州人为主的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义兴对其他帮群采取开放的态度，但除了潮州人之外，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义兴以外的社会组织存在于19世纪的新山。新山人数零星的小帮群内聚力强，这样的内聚力主要展现于他们各自为底下群体处理丧葬事务，进而自设总坟之上。



照片4：绵裕亭义山内19世纪建立的总墓

在田野调查中，发现5个设立于19世纪的总墓（照片4），它们分别为“广肇府列位先人坟墓”、“台山黄江夏堂总坟”、“客社总坟”、“胡梁伍列位先人坟”，以及“刘关张赵坟墓”。一般上，总墓是人群组织将散布义山各处属下无人祭祀的孤坟及骨骸加以收集，或是将属下无后人祭祀的牌位统一安葬，以在日后共同祭祀，是组织对属下成员的一种照顾机制。

“广肇府列位先人坟墓”是地缘性的总墓，它并无标明确切年代，从名字上推知，它埋葬了不少社会阶级较低的下层广府和肇庆劳工。总墓的出现，相信与1878年成立的广肇会馆有关，是广府帮领袖为底层劳工提供的社会福利。

“台山黄江夏堂总坟”²²为地缘与血缘性重叠的总坟，是埋葬广府台山黄姓人士的总坟，由许多个小墓碑所组成，故性质有如规模较小的义山。其主体重修于民国十七年（1928），但其后面的墓碑当中，最早的墓碑年代为1888年。该总坟的设置相信与新山广府台山籍大头家黄亚福有关。

“客社总坟”主要属方言群性质，是客家组织为其属下人士所设，为客社总理刘海镗领导下建立。墓碑为光绪十四年（1888）重修，故在1888年以前，总坟便已存在，由此推知1888年以前便有客家移民在此活动。

“胡梁伍列位先人坟”立碑于光绪十二年（1886），是胡、梁及伍姓人士所有。此三个姓氏因拥有共同的堂号（安定堂），故依此而相互凝聚；“刘关张赵坟墓”重修于壬辰年（1892），是刘、关、张、赵四个姓的人士所有。在马新地区，这四个姓氏的移民多组成“古城会”的组织相互凝聚。这两个姓氏总墓的规模较其他地缘性总墓来得小，设计简单，往后也缺乏修建维护，故相信这两个姓氏组织在当时的经济实力不大。目前这两个组织都没有在新山继续运作。

总体而言，这些总墓的出现，在某程度上反映了新山在19世纪便已经出现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化，从中也展现了这些人群组织的组织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组织多以方言群以及血缘的依据相互结合，尚未出现以业缘等其他属性的组织总坟。而从这些墓体的修建规模看来，地缘组织较血缘性组织的经济实力来得大。

（四）19世纪墓碑资料所蕴含的帮群关系

在义山调查中，能够反映19世纪帮群关系的资料主要有各帮群墓碑之间的分布关系、义山管理者的身份以及各类总坟的发现。

一般而言，马新地区主要有三种不同性质的义山，首先是血缘性的义山，如土乃的黄氏江夏堂义山；再来是地缘性的义山，如麻坡广肇义山亭；最后则是跨地缘性的绵裕亭义山。不同性质的义山象征着各种属性群体的互动与凝聚，因此义山往往被当作是检视一地帮群关系的重要指标。

绵裕亭义山属于跨帮群性质的义山，在早期人们普遍按地缘和血缘各分气类的社会环境中，绵裕亭的跨地缘性质，原则上代表新山华人社会整合的时间相当早。根据墓碑的卫星定位资料，发现每个时期来绵裕亭下葬者均包含各个不同的帮群，但不同帮群的墓碑却没有特定的空间集中趋势，各帮人士的墓碑零星参杂在潮州墓碑之中，此一事实似可反映帮群间的分际并不明显。（图4）

²² 台山黄江夏堂总坟原址由于1970年代末兴建火化场而迁往哥打路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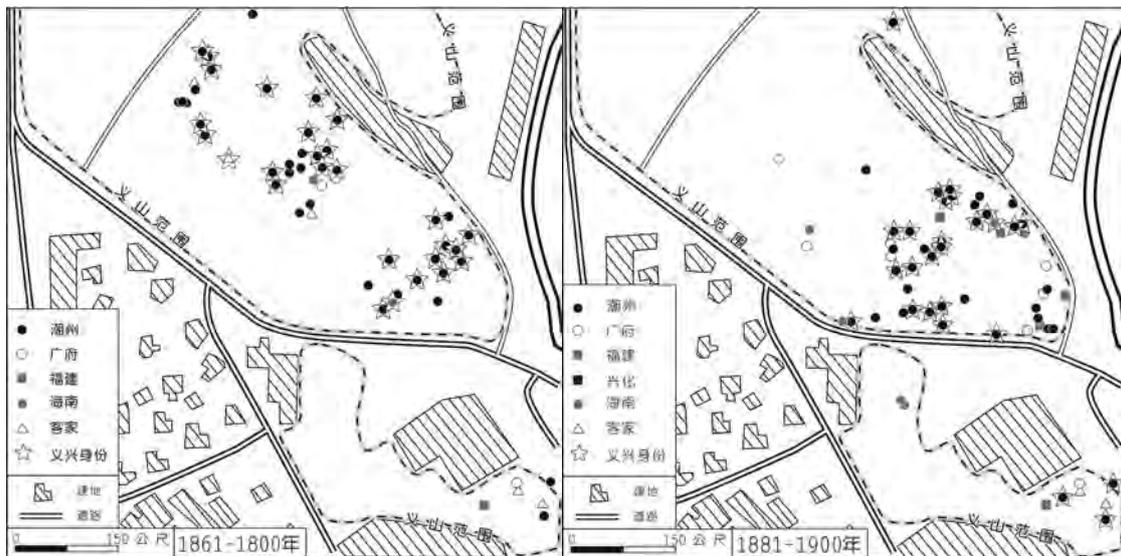


图4：1861-1900年绵裕亭义山各帮群墓碑分布图
注：一点代表一个墓碑

然而，从义山的经营者和一些地缘总墓的发现，却似乎与一般“整合”的概念有所差距。义山最初的设置与潮州义兴公司这一社群有密切关系。到了19世纪后期，此一结构并无多大改变，根据1885年柔佛苏丹所颁发的土地使用权状，义山的产权由义兴公司的关系单位—乾坤公司所有，其产业信托人 (trustee) 为3名潮籍领袖余能财、余壬癸以及Ku Kiak²³。（吴华 2000：139）故此时期义山的控制权仍由潮州人所垄断，而此时期义山中的墓冢大多属于潮州墓，其他帮群的墓尚属零星，这种现象到了19世纪80年代仍然显著，到了19世纪90年代，其他帮群的墓才开始增多。

上述的发现显示的意义是，19世纪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系以潮州帮群为主体，其他小帮群则依附在潮州帮群之间共建家园。潮州帮以外的小帮群，或因为经济实力不足，无法自立义山；或因人口规模不大，无需另设义山。更重要的是，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在义兴的领导下，潮州帮群并不排斥其他小帮群，小帮群也有融入大帮群之中，共同分享资源的趋势。

（五）小结

总结19世纪墓碑资料的分析，发现：

- 1、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以潮州人率先移入为缟矢。移入者在潮州义兴的领导下，招徕华人劳工，从事地方开发，并为自己和公司属下的劳工设立义山，作为往生以后的归宿。

²³ 由于三人为看似天地会有关的“乾坤公司”代表，且前两者（余能财、余壬癸）皆为19世纪末胡椒、甘蜜的富商，而余氏在19世纪的新山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余能财的父亲为新山甲必丹余泰兴。余壬癸曾向清朝政府捐购奉政大夫的官位，其父亲为余勉都，与同时期的新山义兴领袖余勉旺为同字辈的族亲，故推测他们是义兴公司中的重要人物。

- 2、随着移垦事业的展开,潮州以外的华人帮群也陆续移入,但人数较少。这些移民往生后,有能力者安葬于绵裕亭,并有墓碑铭记;无能力的苦力劳工,有的路死沟埋,有些被帮群或其他社会组织收葬于总坟中,如广肇府列位先人坟墓、客社总坟等。
- 3、墓碑铭记显示,义兴公司在19世纪晚期的新山华人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其反清复明的色彩减弱,义兴领袖已有向清朝政府输诚捐官的现象。
- 4、19世纪末期的新山华人社会虽仍以潮州人为主体的,但已出现小帮群和潮州帮群分享资源的趋势。

五、20世纪的绵裕亭义山与新山华人社会

进入20世纪,新山无论是社会或经济发展,都较19世纪来得繁盛的进步。根据官方统计,当时移入新山的人口渐多,(Nathan 1922: 85)其他各帮群的比例也因此大增。在19世纪独领风骚的义兴公司到了此时则因甘蜜胡椒的没落而导致势力大为衰退,(白伟权、陈国川 2013: 96)最后在英国的压力下被令解散。这时期的各帮华商则共组华侨公所,继续领导新山华人社会,同时接管绵裕亭义山。华侨公所中,各帮领袖都有担任要职,(白伟权2011: 115)从此组织结构能够看出,这时期新山华人帮群的分际已经减少。上述人口的变迁与帮群关系的变化也能反映在墓碑的普查资料当中。

(一) 20世纪新山的人口组成与帮群结构

本研究将绵裕亭义山20世纪以后所出现的墓碑整理成表4,此一结果也符合官方资料中新山人口的增加以及帮群比例逐渐缩小的趋势。(Nathan 1922: 85)在20世纪新山华人人数的组成上,可分作以下两个阶段来谈:

表4: 20世纪绵裕亭义山内墓主的祖籍来源表

年代	祖籍 单位	广东省					福建省					客家	广西省	其他	总数	男 (人)	女 (人)	性别比 (男=1000)	
		潮州府	广州府	肇庆府	高州府	琼州府	雷州府	泉州府	漳州府	福州府	兴化府								福宁州
1901年 — 1920年	墓碑个数	90	91	14	3	43	3	51	12	19	4	1	19	0	4	354	279	124	444
	%	25.4	25.7	4.0	0.8	12.1	0.8	14.4	3.4	5.1	1.1	0.3	5.4	0.0	1.1	1000			
1921年 — 1942年	墓碑个数	221	93	27	5	62	0	81	18	45	10	0	70	5	7	644	465	317	682
	%	34.3	14.4	4.2	0.8	9.6	0.0	12.6	2.8	7.0	1.6	0.0	10.9	0.8	1.1	1000			

批注与资料来源同表2

1、1901—1920年：

在此期间使用义山者有354个样本，显见20世纪新山人口较之前有大幅增加。当中潮州墓占25.4%、广府30.5%、福建17.8%、海南12.1%、客家5.4%、福州5.4%、兴化1.1%、福宁州0.3%、其他²⁴ 0.3%。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段的潮州墓只比前一阶段的多出27个，相对地，广府墓则大幅增加了82个，使得广府人的墓碑数超越了潮州人。但此一现象在下一个阶段（1921-1942）中，又呈现逆转的趋势，因此估计为样本数上的误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潮州人的主导地位明显淡化，他们在此期间已不是新山市街唯一的优势群体，其他帮群的人口数也逐渐赶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帮，如广府和福建帮。此外，也能发现这时候新山市街的帮群杂异度较19世纪有所提高，性别比方面则无多大改变。总体而言，迈入20世纪以后，新山出现人口大量增加、各帮群人口比例的差距缩小，且帮群杂异度提高等的现象。这些现象展现新山地区的华人社会，已逐渐呈现相当多元化的社会风貌。

2、1921—1942年：

这时期共有644个墓碑样本，在数量上几乎呈现倍数增加，显示新山的人口规模再次大幅提升。其中潮州墓占了34.3%、广府19.4%、福建15.4%、海南9.6%、客家10.9%、福州7.0%、兴化1.6%、广西0.8%和其他1.1%。这时期的帮群比例跟前期相比，并无显著变化，各帮实力持续趋向平均。此外，20世纪除了主要帮群比重差距缩小外，也发现新山五大帮以外的其他祖籍来源开始变多，如河南、浙江、上海、江苏、槟榔屿等地。在性别比方面，这时期的男女比例悬殊的现象有所缓和，女性人口比重提高，显见新山以男性为主的移垦社会特质已在此时期逐渐淡化。

在上述新的时代里，由于各帮的兴起，也导致新山华人社会中，以潮州人为绝对优势的帮群结构出现了变化。

（二）20世纪墓碑资料所呈现的社会组织

进入20世纪，随着橡胶产业的兴起，柔佛胡椒、甘蜜经济开始衰退，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地位也大受打击，（白伟权、陈国川 2013：65-102）且在1916年遭政府勒令解散。义兴在20世纪的失势也反映在绵裕亭义山的墓碑当中。据调查，20世纪刻有“冂”字标记的墓碑比例已在墓碑总数的增加下，大为减少，成为该罕见的景观，到了191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几乎不再出现刻有“冂”字的墓碑，显示义兴在社会上角色的淡化，此现象与义兴主导新山华人社会的19世纪形成强烈对比。（图5）因此可以得知，“冂”墓比重在时间轴的变化，与柔佛义兴的没落，以及胡椒、甘蜜产业的衰退有着高度的正相关。

²⁴ 包含暹罗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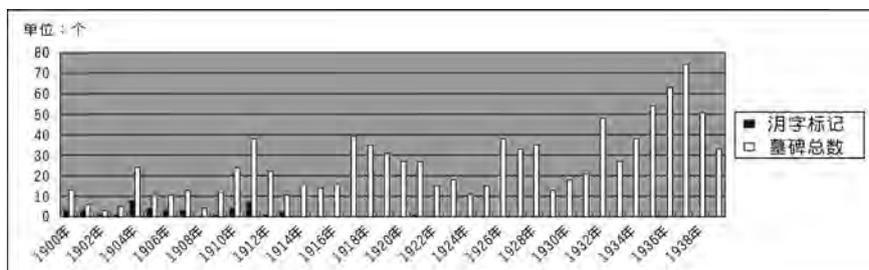


图5: 绵裕亭义山“涓”字碑与一般墓碑的比较 (1900-1942)

注: 1934、1938、1941年无资料。

资料来源: 2010年7、8、9月田野调查

此外，随着商业的发展，各帮人口逐年增多，在新山市街经营各种生意的各帮商人也逐渐兴起，20世纪的新山已发展成为工商业社会，那么其商业活动必定较19世纪的拓垦时代来得多元，分工趋向精细，而此时的义山也开始出现一些与行业相关的个人墓碑以及总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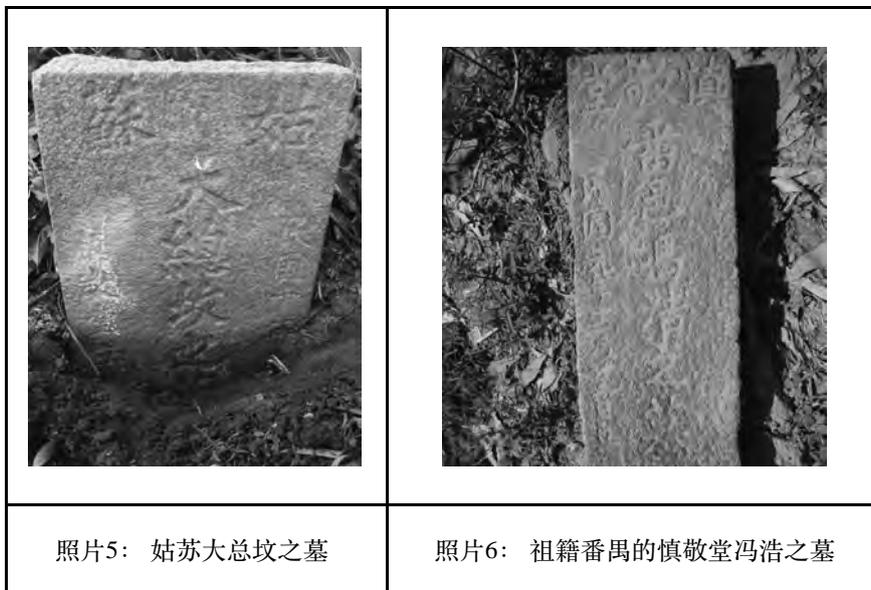
这些有标示行业堂号的墓碑之中，又以姑苏行最为显著。“夫姑苏同业，乃属吾粤之酒楼茶室粉面熟食劳资双方联合组织”（黄国泉 1958：2）早期在酒楼从事煮炒餐饮的行业称为“姑苏行”，“姑苏行”虽为业缘团体，但由于所参与者都是广府、肇府地区的移民，因此也带有地缘的性质。本研究所搜集的4个姑苏行资料中，便有3个属于广府籍样本。（表5）此外，在这些姑苏行业者的墓碑当中，都刻上了“慎敬堂”的字样。在现有的星马姑苏联合总会（1958）的资料中，慎敬堂为新加坡姑苏行的堂号，²⁵ 新山则无专属的堂号及分堂的设置，因此可以推知新山姑苏慎敬堂为新加坡的延伸，是新加坡和新山两地密切关系所展现的结果。

表5: 绵裕亭义山中与姑苏行有关者之墓碑

籍贯	年代	姓名	备注
顺邑 (广州府顺德县)	宣统三年六月(1911)	龚永	姑苏慎敬堂
番邑 (广州府番禺县)	辛亥年元月(1911)	吴添	慎敬堂; 孝男亚伦
香邑 (广州府香山县)	民国元年十一月廿二日(1912)	冯浩	慎敬堂
西南 (地点不详)	民国八年十月吉日(1919)	杨廷初	慎敬堂
--	民国十年 (1921)	姑苏大总坟之墓	慎敬堂立

资料来源: 2010年7、8、9月田野调查

²⁵ 不同地区的姑苏行有着不同的堂号，马新地区的分堂包括：新加坡姑苏慎敬堂、吉隆坡姑苏慎忠行、怡保姑苏慎全行、太平姑苏慎远行、檳城姑苏广存堂、马六甲姑苏慎兴行。新山没有专属堂号，但根据墓碑调查，葬于新山者都属“慎敬堂”，因此新山为新加坡慎敬堂的延伸。



拍摄日期：2010年9月15、16日

目前新山虽然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当地姑苏组织的活动，但绵裕亭义山的墓碑却揭露了新山广（肇）府人所垄断姑苏行的事实。到了1921年，新山广府系的姑苏行已经有组织性地为底下无后人祭祀的成员设立“姑苏大总坟之墓”。（照片5、6）

除了酒楼煮炒的姑苏行以外，1903年还有以“梨园”为抬头的墓碑，²⁶ 梨园指的是戏班行业。绵裕亭义山也出现一些性质不明的堂号，如厚福堂。²⁷

上述所出现的业缘团体主要属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性质，如酒楼、戏曲等行业，是第三级产业在1900年代前后在新山发展下的结果，显示新山商业的繁盛已较19世纪更为显著。

（三）20世纪墓碑资料所蕴含的帮群关系

20世纪新山华人社会内部的帮群关系主要表现在义山各帮群墓碑的空间分布、五帮领袖共同祭拜的“明墓”，以及这时期义山管理者的身份等面向之中。

在本节的第一部份已藉由墓碑得知新山华人社会在帮群组成上，各帮人口比例开始持平，过去几乎为潮州人的小汕头特色已逐渐淡化，各帮群整合与否的问题，按理也应在此出现。

一般上，在市镇帮群人数众多，且各帮势力相当的情况下，多半会出现以原乡地缘为单位的义山，²⁸ 根据前面义山调查及官方档案所得出的人口资料，20世纪的新山各帮显然已经具备各自独立的条件，但并未有群体另辟土地，独立设立新的义山，绵裕亭义山跨地缘的特色仍然维持不变，且义山内部不同帮群的墓碑也混合分布，空间上并无进一步发展

²⁶ 墓主为梁叙，祖籍为粤东冈州。

²⁷ 义山有两个厚福堂墓碑，一为1909年祖籍广府新会的陆门黄氏安人；另一为1914年祖籍福建南安的王祖杏。

²⁸ 在怡保、太平、麻坡等大城市均出现类似状况。

出以帮群为单位的分区，（图6）反而维持19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因此20世纪的新山华人社会关系，在某程度上，应可被视为是整合的。



图6：1901-1942年绵裕亭义山各帮群墓碑分布图
注：一点代表一个墓碑

此外，新山华人社会帮群间的正面关系也可反映在绵裕亭的一块墓碑—“明墓”之上。“明墓”是义兴遭政府解散后于1921年所建立，据说其中并无骨骸，而只是埋葬义兴神位等物品的衣冠冢。“明墓”设立标志着义兴时代的结束，义兴公司在清盘时，其中的20,000元余款最终被法庭宣判纳为宽柔学校的资产。宽柔学校是一所由新山五大帮群的商人共同建立的学校，因此由五帮领袖所组成的董事会每年春秋二祭都会到“明墓”致祭。此一过程为义兴到五帮权力的和平过渡，也标志着新山五帮共和时代的来临。

义兴解散后，负责管理义山的乾坤公司估计也遭到冻结。在此时期已有相当实力的各帮商人则取而代之继续领导新山华人社会。1923年，两名潮籍领袖纪力豪与Heng Kit Chye（音译王吉财）向柔佛法庭申请庭令，将义山地段归华侨公所管理。1925年，法庭委任客帮的潘成容、Tan Boon Thye（音译陈文泰，或为潮籍）和华民政务官为义山产业的信托人，义山正式由华侨公所管理。（郭鹤尧，1997：108-109）

华侨公所是新山5大帮群共同建立的社会组织，由义兴最后一位领袖林进和与其他各帮领袖于1922年共组。在华侨公所的组织架构中，各帮代表地位相等，成为超帮群整合的华社最高机构。（白伟权 2011：115）从乾坤公司到华侨公所，也意味本由潮州人（义兴）所有的义山，如今成为各帮共有的社会资产，勾勒出新山华人社会整合的关系图像。

(四) 小结

总结20世纪墓碑资料的分析，发现：

- 1、19世纪末期，其他小帮群和潮州帮群分享资源的现象，在20世纪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透过墓碑资料的分析，20世纪初新山地区由潮州帮群主导的地位已逐渐淡薄，帮群间人口规模的差距缩小，华人社会逐渐呈多元化的风貌。
- 2、20世纪初期，姑苏（或慎敬堂）及梨园相关墓碑的发现，显示出新山地区华人社会的经济活动，除了热带经济作物的栽培与加工外，也出现需要较大商阈（threshold）的服务业。华人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呈现部门分工、产业多元化的现象。
- 3、潮州帮群主导地位减弱，产业活动趋向多元，加以义兴公司解散，管理义山的乾坤公司遭到冻结，改由华侨公所管理，新山华人社会帮群互助共和共荣的趋势日益明显。

六、结语

碍于早期留下的文献较少，影响了人们对19世纪华人社会及人口发展面貌的认知，藉由墓碑的普查或多或少能成为拼凑早期社会面貌的另一途径。一般上，义山的墓碑往往被拿来当作是判定一个地方的大致开发时间，以及了解地方名人列绅生平的途径。但倘若大范围进行搜集的话，更能够突破官方行政区或统计区的限制，使人可以得知地方人口及帮群的变化趋势、性别比、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等具有讨论价值的社会性指标。因此在无资料的情况下，墓碑为最好的替代性资料；即使在有资料的情况下，它也能辅助研究者在还原一地早期社会面貌时，起画龙点睛的具体化效用。针对新山的案例，墓碑普查所能提供的一些贡献如下：

- 1、在人口方面，新山人口数以及帮群结构，在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动态变化过程，有了具体的表现方式。在19世纪中叶开埠初期，新山人口规模不大，且帮群单一，以潮州人为优势。此后各阶段，新山人口呈倍增长，到了20世纪，可以明显看出新山人口以及其他帮群的移民大为增多，其中又以广府人的增幅最大，跃升成为新山第二大帮群。潮州人在此时期已非新山市街的优势群体，在帮移民人口的比例增加下，地位明显淡化，新山逐渐呈现帮群杂异化的社会面貌。
- 2、透过“泔”墓的调查与统计，新山义兴的兴衰有了量化的表现方式。在19世纪高比例的“泔”墓说明了义兴在当时潮州人为主的新山华人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泔”墓比例有降低的趋势，义兴的影响力明显下滑，此变化趋势与柔佛潮州人主导的胡椒、甘蜜经济衰退，时间恰好相符。因此义兴在20世纪的没落，并不全然是1916年遭政府解散的结果。
- 3、经由“泔”墓帮群比例的整理，有助于厘清早期与义兴有关系者的身分。在“泔”墓的使用者之中，有高达90%为潮州人，其他帮群虽然也有“泔”墓的案例，但人数很少。此一资料使得“新山义兴属于潮州义兴”的说法，有了明确的注脚。但是，有鉴于新山第二大的广府社群无人使用“泔”墓，与义兴较无关系，显见，虽然“新山潮州义兴能够容纳其他帮群”，但却非每个帮群都必然与义兴有关，故此一论述仍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
- 4、有助于重新发现一些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又曾经在新山活动的组织与群体，如姑苏行以及安定堂（胡梁伍列位先人坟）、古城会（刘关张赵坟墓）等组织。透过义山内众

多无名墓的发现，可以唤起人们重新关注一些被世人遗忘，但却是在早期新山实际参与开发及发展的先人。

- 5、透过不同属性的社会团体墓碑，及其出现的时间，了解新山社会及产业发展的进程。在19世纪所出现的总墓主要以地缘和血缘为主，到了20世纪则开始出现一些餐饮和娱乐等与第三级产业相关的总坟。更重要的是，分别由不同帮群操作之餐饮娱乐等商闾需求较高行业的出现，除展现华人社会经济结构逐渐成熟外，部门分工与产业多元化的现象，也成为帮群间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虽然义山墓碑能够有效解决一些文献资料上的不足，但它还是存在许多研究上的限制以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 1、由于许多墓碑年代已久，经历风化、人为开发等破坏严重，加上有许多墓碑并无标示年代、祖籍等基本资料，增加了无效样本数，无疑降低样本数的效度。
- 2、墓碑的调查结果无法代表绝对数字，只能反映人口变化和帮群组成的相对趋势。
- 3、由于地方在拓垦初期，并不是每个人有能力立墓碑，因此无法反映确切的人口数，难以将当时的人口与往后的墓碑资料比较。
- 4、墓碑所反映的社会面相仍然有限，虽然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能有所作为，但在出现其他资料时，它仅能作为辅助性的工具使用。
- 5、义山范围大且偏僻，调查者的人身安全应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此外，墓碑调查耗时耗力，故较适合以团队的方式执行。

总体而言，一般人敬而远之，充满恐惧意味的义山，其实烙印了时间段中人一地关系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华人市镇的宝贵资产。虽然无法用墓碑完整地呈现一地的社会面貌，但在无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它能够协助研究者大致拼凑出地方社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成为认识早期地方社会的另一种途径。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不同的地方有其各自的区域体系及历史脉络，故所拥有的元素也不尽相同，由义兴老义山所整理出的要点也并非各地都一样，同样地，其他地方所具备的元素也未必出现于新山，因此义山的调查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中文:

- 安焕然, 〈义兴精神〉, 《星洲日报》, 2008年3月16日。
- 白伟权, 2011, 〈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1855-1942)〉,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硕士论文。
- 白伟权, 2013a, 〈绵裕亭义山的“冢”墓〉, 新山中华公会编, 《九鼎传薪, 世代为公: 新山中华公会九十周年纪念特辑》, 新山: 中华公会, 页449-463。
- 白伟权, 2013b, 〈从政治标示到族群边界: 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绵裕亭“冢”与“皇清”墓的个案研究〉, 发表于2013年5月31-6月1日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暨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中研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主办, “2013年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 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下的台湾与东南亚”。
- 白伟权、陈国川, 2013, 〈从甘蜜园至橡胶园: 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柔佛的地景变迁〉, 《亚太研究论坛》, 第58期, 页65-102。
- 陈育崧, 1983, 〈关于冢墓的研究〉, 陈育崧编, 《椰阴馆文存·第一卷》, 新加坡: 南洋学会, 页100-103。
- 郭鹤尧, 1997, 〈新山中华公会产业报告书〉, 新山中华公会编, 《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新山: 中华公会, 页108-110。
- 黄国泉, 1958, 〈发刊词〉, 《星马姑苏联合总会特刊》, 新加坡: 星马姑苏联合总会, 页2-3。
- 李国祁, 1978, 〈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 《中华学报》, 第5期第2卷, 页131-160。
- 李永球, 〈死人不可入村?〉, 《星州日报》, 2009年11月22日。
- 林富士, 2000, 《孤魂与鬼雄的世界: 北台湾的厉鬼信仰》, 板桥: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 麦留芳, 2000, 〈星马殖民地时代的人口普查资料简介〉, 《东南亚区域研究通讯》, 第12期: 页2-5。
- 吴华, 2000, 《新山今与昔》, 新山: 海南会馆。
- 许云樵, 1977, 〈柔佛华人拓殖史〉,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编,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四十三周年纪念暨新厦落成开幕双庆特刊》, 新山: 潮州八邑会馆, 页147 - 155。
- 颜贝珊、余清祥, 2010, 〈2010年各国人口普查制度之研究〉, 《人口学刊》, 第40期, 页203-229。
- 颜清煌, 2007, 〈清朝鬻官制度与新马华族领导阶级 (1877-1912)〉, 张清江编译, 《新马华人史译丛》, 新加坡: 青年书局, 页115-152。
- 叶汶鑫, 1997, 〈新山中华公会史实片段回忆录〉, 新山中华公会编, 《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新山: 中华公会, 页69 - 71。
- 郑良树, 2004, 《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 新山: 南方学院。
- 庄钦永, 1996, 《实叻峨槽五虎祠义士新义》, 新加坡: 南洋学会。

英文:

- Buckley, C. B. 1902.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 Colonial Governmen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5. *Colonial Director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including Sarawak, Labuan, Bangkok and Saigon for 1875*.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 Cowgill, J. V. 1924. "Chinese Place Names in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221-247.
- Fairlie, J. 1892. "Life in the Malay Peninsula". *The Century Magazine*, 35: 577-587.
- Khoo, K. K. "Johor's 'friendly' secret society", *The Star*, 20 April 1997.
- Lim, P. H. 2000. "Continuity and Connectedness: The Ngee Heng Kongsi of Johor, 1844-1916". *Visiting Researchers Series No.2*. Singapore: ISEAS.
- Nathan, J. E. 1922.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Straits Settlements: Superintendent of Census.
- Pickering, W. A. 1879.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Part II."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 1-18.
- Trocki, C. A. 1990.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rocki, C. A. 2007.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Singapore: NUS Press.
- Vaughan, J. D. 1879.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 Vlieland, C. A. 1932.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